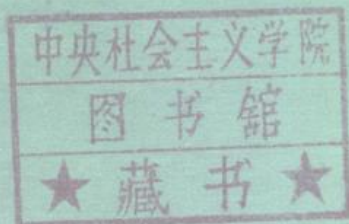


# 中国与世界

〔澳〕费思荣著



商务印书馆

D820/1

55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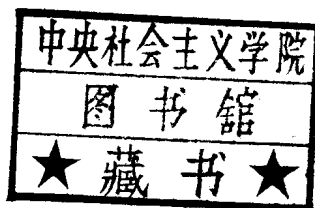
# 中国与世界

〔澳〕费思葵著

郑强译



\*200055867\*



商务印书馆

1980年·北京

# CHINA AND THE WORLD

*Stephen Fitz Gerald*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in association with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 1977

## 中国与世界

〔澳〕费思葵 著

郑 强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frac{1}{32}$   $3\frac{1}{4}$ 印张 66千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8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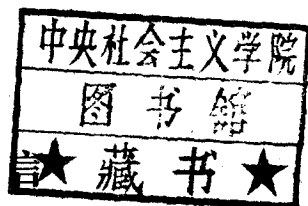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 3017·277 定价: 0.29元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莱写的一本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得比较深入的书。作者对我国的态度友好，对我国对外政策的看法有独立的见解，有些观点也有预见性。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书。全书共分六章，现译出前五章，供有关方面参考。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1  |
| 第一章 中国对世界事务的态度 ..... | 5  |
| 第二章 中国、美国和苏联 .....   | 27 |
| 第三章 中国和东南亚 .....     | 47 |
| 第四章 中国和日本 .....      | 68 |
| 第五章 中国和澳大利亚 .....    | 82 |



前

在我任大使期间，不幸发生了近年来澳大利亚外交史上一桩喧嚣一时的不自觉的“失密”事件。当我从（人们想象中）保密的政府公职退处于公开探讨问题的学术界时，自不忘注意通常的纪律，还外加几分小心。一方面，我深知泄漏政府之间的机密可能引起种种麻烦，因而也许比别人更为注意一定要保护由于我的职务而获悉的机密。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有多少本该保密的消息往往不慎而走被公诸于众。不幸，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偶然的“泄漏”，也有是故意的别有用心心的“泄漏”。我所以用不幸这个字，是因为外交人员之间所辩论的问题中，有许多本来就是应该公诸于众的，而且这样做并不会有损于历届澳大利亚政府，也不会有损于他们与外国政府的关系。例如，“北京失密”（就是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和中国总理华国锋的第一天谈话的记录落到了一个记者手中），在当时固然有些困窘不安，但是其结果并无损于我国与中国或者与那份记录中所提到的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无损于澳大利亚总理在北京谈判的问题的利益。这类事情只有在两国关系已经恶化了的时候或者有人正要找岔子的时候才会“有害”。我并不怀疑美国情报界人士甚至欢迎这次失密，他们可以拿这件事作为证据，来证明他们宣扬的所谓澳大利亚安全问题多么严重，他们的真正的（当然是不相干的）目的是，

担心那时贾斯蒂斯·霍普先生进行的官方调查会暴露澳大利亚的情报与安全机构，从而影响到美国的利益。

我不是说，澳大利亚应当把别国政府的秘密想法公开出来，我也决不会把中国政府向我吐露的秘密透露出去。不过我确实认为，政府人员对国际事务与外交政策的想法、考虑、辩论中的不同论点，都应该拿出来公开讨论。公众应该获知辩论的是些什么问题，以及涉及的有关情况。政府人员需要群众监督的刺激，特别是在政策的制订阶段，或者是在外交当局的一般性指示要通过工作人员的理解而化为实际执行的政策的时候。公众也应知道外交政策制订过程中起作用的各种根深蒂固的观点、“游说集团”和各种压力，而且要有机会对此发表意见。

这里的讲演包括我在北京任大使期间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某些主要看法和辩论的回顾。当然，关于中国的对外关系，可谈的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以后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写出来。目前这些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全国各地所作的讲演，涉及的范围是有限的。看来重要的是，要在离开中国后尽早地公开讨论我们在使馆内部、跟我们在北京的外交界同仁、跟我们在堪培拉和别处的澳大利亚外交界同事辩论的各种观点。讲演里不乏臆测、历史的回顾和个人的见解，其主要目的无非是提供那些同中国打交道的政府和人民在应付中国外交政策的现实问题时作为参考。有些观点在不任公职的人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好像在对稻草人进行冲刺。但是每一观点都直接牵涉到现实的而且大部分是尚未解决的业务问题，都涉及到澳大利亚以及别国政府人员中有分歧的理解或矛盾的见解。

我这些观点不是打算要用一种模式从政治上来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且，说实在的我对迄今所提出的各种模式是有保留的。这倒不是因为用模式来预测中国政策的倾向可能发生错误或是没有什么价值；这些都是在意料之中的。问题在于，这类模式会使中国的政治“象机器一样，没有个性”，会使人自以为是，而决策者们会一味依靠这类模式作为解释复杂的政治制度的方便快捷径。我以为，凡是研究现代中国的人，终究不免会提出关于中国政治行为的某种一般性理论，我也未能免俗。但是一般性理论应当终究是一般性理论，不能代替对现实问题的经常的注意。

这并不是说，这些讲演都是“偏重政策的”，或只是关于一时现象的，或者是忙碌的官员供忙碌的使节估计情况之用的迅速的反应。这些讲演中也包括我生活在中国时直接观察中国的对外关系而得出的一些较为深远的结论。无庸赘言，中国政府或澳大利亚政府对我的见解都不负任何责任。在说明这一点以后，我要以感谢的心情指出，如果不是得益于我在北京三年半期间同中国的领导人和官员们举行的无数次会晤、宴会、讨论和辩论，我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将会贫乏得多。我还必须感谢在北京的使馆中和我共事的有才能的澳大利亚青年外交人员，他们使我得益非浅。这些讲演里假如还有些有用的内容的话，那就多亏了使馆人员的专门知识、高尚动机和热忱，以及我们在使馆里每天进行的各抒己见的争鸣。

这些讲演稿写于我从政界退居学术界的期间，是我离开北京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中国问题的尝试。每篇讲稿都讲过多次，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听众提出的问题作了修改。

这里所发表的已不尽同于讲演时的原稿，也不尽同于澳大利亚广播协会所播的稿子。在“不停的活动”中准备并发表了这些讲演后，我现在已把注意力转向于有关中国近代历史和我在中国的经历的别的方面，我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把这方面的论述陆续出版。

我在北京的期间帮助我提高业务知识或者在其他方面使我获得教益因而我应该提名致谢的人是太多了。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在别的地方致谢而在这里只对一个人表示感戴的话，谁也不会说我鄙吝的。我所要感戴的这个人就是任命我的高夫·惠特拉姆，伟大的澳大利亚人、难忘的总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战后澳大利亚唯一了解世界，从而了解必须做些什么来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的政治家，而且不仅如此，他使自己登上了那个使他能够实现这种愿望的地位。

费 思 茱

1977年8月23日 于堪培拉

## 第一章 中国对世界事务的态度

我以为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极大多数同中国有重要关系的政府，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是怎么回事，中国人行事的动机是什么。当然，这些政府根据自以为熟悉的中国人的做法作出判断。他们在处理影响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的日常决定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颇为自信，然而我发现，他们在估计中国的行为时却并不真正存在这种信心。我认识的政治家，或者外交人员，或者别的政府顾问，差不多没有什么人对他们自己对中外政策的分析（或者，就这一点来说，在同中国打交道方面）是满有把握的。他们多半只是在泛泛地交往，他们所表白的见解只有极浅薄的和不可靠的理性基础。说真的，我近几年在北京觉得下述这种现象倒是挺有趣的：各个政府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承认对中国人的思想迷惑不解，或者承认他们自己无法使中国人了解他们的意图。显然，在交往和了解方面存在着一个极为明显的问题。

中国本身其实并不祈求世界了解。中国的领导人和官员们知道西方对中国有奇怪的想法，因为他们极为密切地注视着外界关于中国的各种想法，不论是口头的或者是见诸文字的。我确信，他们会乐意看到同他们打交道的人作出更大的努力来了解他们的社会。不过，因为他们有耐心，而且对政治有长远的看法，所以他们大概认为时间最终是对他们有利的。又

因为尽管我们不了解他们，而他们却具有了解我们的相当能力，所以，在目前，他们大概并不会对我们在同他们取得谅解方面所经历的理智上困难感到十分不安，除非是发生由于误解中国的动机而引起重大政治危机的情况，那当然又当别论。

但是，麻烦的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些在近十年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百三十年——同中国打交道的国家，对中国为什么那么行事却糊里糊涂地不甚了了。这种批评中也包括苏联或东欧对中国的态度在内。既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认识到他是世界事务中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这种不甚了了对我们比对中国人更为有害。

因此，这篇演说不是为“可怜的被误解的中国”说话，而是提出一种主张，说明我们对中国以及对其外交政策所依据的态度，要有更大的理性上的注意，当然，这种注意也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这篇演说更不是自吹以为有了神妙的了解。若是在谈到另一个社会时，自以为是唯一了解真相者，实在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自骗自情况了。我只能说我有过一个机会呆在中国，观察中国，从而发现我对她了解得多么少；我认为，或者至少是我希望，这点是某种开端。

我在这些讲稿中没有打算提出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般理论。我觉得，所谓全面理论也好，一方面对于必须处理问题、作出反应的各国政府，在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迄今并没有什么助益，另一方面对于必须判断他们政府的行动，或者只是希望了解情况的人民、非专业人员，在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也没有什么助益。而人民和政府才是重要的。我并不反对建立政治理论，不过我不相信有人能够作出一种有效的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般性理论。我只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谈到我对中国人行事的主观了解，而我希望，通过我的观察，我可以提供一些可能有用的结论。当然，我不会希望中国政府对我的任何见解负责。

在过去三年半呆在中国期间，我对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和行为的中国特色感触愈来愈深。我相信这种中国特色是一向存在着的。不过我还相信，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他们晚年愈来愈把他们的思想转到了思考中国的五十年革命经验方面，和中国人民的长期历史经验方面，并准备，或许比以前更明确地，承认中国历史对现代中国的思想的不论是积极的和消极的巨大影响。过去十年中考古工作的大量增加——毛和周都对此亲自密切关注——是关注中国过去的一个明显迹象。七十年代对孔子在中国社会中的保守影响的攻击，是另一个迹象。

但是解放后社会的中国特色，是一直存在的。西方的问题就是它见不到这一点，这多半是由于不妨称之为政治文化上的原因，关于这点我下面将要谈到。有些历史学家企图通过比较旧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形式来证明中国社会的“持续性”。但是他们的论点往往是勉强的和夸张失实的，或者，因为他们没有着重指出共产党中国的共产党“坏处”，因而是不得人心的和不为人所接受的。西方的注意力常不免避开中国特性，而专注意于新的方面。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讨论，成了五十年代冷战讨论的一部分，后来又为中苏论战、中国的人民战争的主张、越南、革命以及现在是对超级大国的斗争，这一连串事件所决定。撇开中国是不是具有侵略性和扩张主义这种

没有意义的政治上乱弹琴不说，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认真注意，集中在马列主义的特点上，集中在毛的革命路线的革命性上。但是这种注意也有它的不恰当之处。它忽视了毛主席自己对中国过去的关注，他的马列主义必须配合每个国家具体情况信念，他要中国人民“古为今用”的指示。

在我看来，中国的国际行为，在许多重要方面，包括马列主义哲学的重大意义和毛自己的巨大贡献在内，是由必然的中国式的态度和想法所支配的。我的意思不是指孔子思想或保守思想，我也非常不同意1949年中国干脆产生了一个新“朝代”的想法。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在根本上改造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改造了政治关系、工作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由于引入了阶级斗争。但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有同外国打交道的长期历史，并且产生了一些与现代欧洲发展出来的支配着国际关系行事的准则有所不同的见解。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和革命的社会制度。但是它仍旧是一个中国式的国家。西方的问题与其说是它不能了解社会主义中国，不如说是它不能认识或理解中国人行为的固有特色。

在我再进一步谈下去之前，我要说一下我是记住下面这种论调会使人陷入错误的：中国人是需要特别努力才能了解的，因为他们作为一种种族来说，同其他人类颇不一样。从历史上说来，这种论调是敌意的和种族歧视性的，认为中国人多少是不够人的标准，“不可思议”到了难以理解和邪恶的程度，或者，用那本伟大的澳大利亚杂志《新闻简报》的话来说：“一种半人半兽的东西，卑躬屈节的坏蛋，鸦片烟鬼。因邪恶、无

知、迷信而堕落退化，一种若与之接触就会使自由和开明种族的子女遭受污染的生物。”（为了公平起见，应当指出，这段话是从十九世纪的该刊而不是上星期的该刊上引述的。）不过，又有另一种论调，就是认为中国人是超出一般人类的，是十全十美的。我觉得这种见解同样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不时可以从某些访问中国者的谄媚奉承态度中察觉到，也同样是可鄙的（我相信中国人也认为如此）。另一种或许虽不可鄙，但却非常愚蠢的见解是：装作在我们和中国人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对中国人和我们都不幸的是，中国似乎是一个老是引人作这种大量无知的概念化判断的国家。

当然，区别的本质既是文化的又是政治的；而这就是使近年来不得不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许多人弄不懂和办事不顺利的中国人行为固有特色的根源。

不论政治家们和外交家们公开说些什么坦率的交谈啦，自在的交往啦，等等，实际上毫无疑问，他们，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觉得要在真正的对话和有意义的交谈方面保持一种同中国人不断推进的政治关系，是极为困难的。他们私下的，有时是半公开的抱怨是，他们无法同中国人真正沟通思想，因而怎么能够认真对待中国，或者真正在政治上同中国打交道，或者把中国当作世界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大国呢？

他们这种抱怨的基础是双重的。首先，是同中国交谈的问题。据说，中国人是不变通的，“他们老是说着同样的话”。当有人私下竭力要求美国的高级发言人说明，为什么他们对于跟中国人进一步对话显然不感兴趣时，他们说，谈也不顶事儿，因为中国人并不真正有兴趣讨论，他们对世界局势有一套

固定的说法，他们老是用这些话来答复。一个澳大利亚高级官员有一次向我抱怨说，他不相信周恩来 1973 年同惠特拉姆总理正式讨论时所说的话是由衷之言。又有一个澳大利亚官员在弗雷泽总理去年访问中国后对一位外国大使说，中国人从来没有什么要说的。

其次，是对中国行为的抱怨。这里我不是在谈中国是否有侵略性或扩张主义的这种旧论调（这种论调似乎倒也不再使西方世界中的许多人把它当回事儿了，虽然不太久以前他们还把这当作是外交政策辩论中的关键问题）。这是一个中国人不像我们那样行事的问题。例如，外国政府的高级外交官们对我谈过，中国人不说我们那一套话，在他们学会这点之前，不能期望认真地把他们当作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这是说，他们不用流行的西方国际上那一套方式谈问题，不使用那一套战略概念和政治概念，不使用那一套语汇，他们不按照我们熟悉的和可以预料的那套方式行事。

人们在同中国打交道时碰到的问题，可以拿西方对中国的成语的反应为代表。我在北京不时有人问我，中国人在谈国际问题时干吗要使用“无可奈何花落去”、“天下大乱”等等这类“古怪”的话。结果我发现有必要来编纂一本中国成语汇解，以便对这些话提供一些基本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来龙去脉，而若不如此这些话就成为费解的了。

既然人们同中国打交道有这种极为明显的困难，当然，就得问一问，该由谁负责来弥合这种裂隙。在我看来，这个责任中国人和我们各居其半。但是不同之处是，中国人的反应是设法了解西方而不一定接受西方的标准，而大部分西方的态

度却是避开对中国的恰当了解，而要求中国顺应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标准。相形之下，这些年来，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态度远较我们接受他们的为多，我认为，这就使得我们应负大部分责任了。当然，除非是接受某些澳大利亚官方人士中流行的中国必须“非神话化”的意见——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中国跟别的任何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它不含有神秘性，不需要对它的文化背景加以了解，因而，跟它就能如同跟，假定说，新西兰、日本、坦桑尼亚或苏联一样好地打交道。

在我看来，没有比这种想法再为脑筋简单的了。在中国于公元前第三世纪统一时起，直到十九世纪建立了一个大体上像中国外交部这样的东西时为止，其间经过了刚好两千年多一点。在这两千年中间，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和持续的政治文化实体，同相邻的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相互发生作用。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欧洲在其中没有份儿。这是一个完整的国际体系。大部分时间，中国是这个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并不奇怪，既然中国人又是官僚政治的发明者，他们在外交方面，在执行对外关系方面当然有着长期的经验。但是他们的概念和态度不是欧洲的概念和态度，或者至少不是我们现行国际体系以之为基础的十九世纪欧洲的概念和态度。今天的中国人是这样一种文明的继承人，这种文明在高度、广度和卓越的创造力等方面，都不逊于欧洲，而在文化的持续性和结合力方面，甚至还超过欧洲。他们又是这样一个世界的继承人，在这个世界里，中国作为支配力量，决定了执行国际关系的准则。

如果像有些人那样，认为中央王国这一概念是从过去时

代产生的某种奇怪的种族中心主义，因而加以忽视，那就是否定一种对人类的贡献至少和整个欧洲的政治文化一样巨大的政治文化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忽视了我们自己的种族中心主义）。中国人承认欧洲的伟大贡献。在面临今天世界西方化具有压倒份量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不承认。而且他们用各种方法试图理解它和适应它，虽然不是总是很成功的。但是特别在西方——我在这里说的又是包括苏联在内——政治家和他们的顾问中间，却有着一种认为西方所发展出来的观念和体系“自然”优越和卓绝的倾向，以致不能看到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卓越，因而也就觉得不需要去加以了解。这就是要中国“非神话化”论点的归根结底的理性上贫困。这就是认为中国自然应当符合中国人并未参与形成的行为准则的想法的根源。这种想法并不属于以左派右派划分的西方社会中的那种“政治”偏见，也与中国的左派或右派无涉；蒋介石就曾抱怨跟他的西方朋友有同样的问题。这也不完全是一个“帝国主义的”问题，因为有些其行为和见解绝非帝国主义的小国，包括中国的某些第三世界朋友在内，也显然具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之所以会产生，大概是由于认为中国神秘的欧洲旧观念，以及由于中国文化的显然自成一体性质；这种文化长久以来一直使外界感到极为迷人而又不肯问津。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决策者和外交家来说，却是不能原谅的。

那末，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人行事的一些表现，看一看建立一种世界观的过程，看一看支配着在一个中国独霸为王的世界中的交往准则的某些概念，看一看语言的使用，看一看似乎来自不妨称之为“中国特性”的外交实践。